

《贩书日记》作者及记时考

王晓娟

《历代日记丛钞》^①第167册所收《贩书日记》，其中涉及大量关于古籍文献购藏与流传的情节，也出现了傅增湘、盛昱、张元济、邓邦述、袁克文等清末民初的重要藏书家，是一部具有重要价值的文献。原书现藏于国家图书馆，无书名和作者。国家图书馆编目时称其为稿本，并拟名为《贩书日记》，但作者项则继续空缺。故而《历代日记丛钞》汇辑此书时，一仍其旧。《历代日记丛钞提要》虽然对《贩书日记》的主要内容作了介绍，但对其作者和记事年份亦未能予以深考。今据有关资料，对其作者及记时问题做一考述。

一、《贩书日记》作者考实

通过一些相关资料的考辨，可以基本推定《贩书日记》的作者为清末民初藏书家和校勘学家吴慈培。主要的依据有以下四点。

第一，《贩书日记》六月二十一日记：“傅丈属校《盐铁论》。”国家图书馆所藏吴慈培之《慈培书目》则在“传记”部分之《盐铁论》写道：“傅丈借得扬州方地山藏本，属余校勘……乙卯（1915）六月廿六日校毕。”这里的“傅丈”指傅增湘。如果傅增湘不是将同一部书同时交与两人去校勘，那么《贩书日记》中“傅丈属校《盐铁论》”的，就应该是吴慈培。

第二，《贩书日记》中记载作者考订邓邦述所藏明刊《史通》中何焯的校语为何焯弟子沈宝砚临写，这条记载在国家图书馆所藏《慈培书目》及《吴慈培日记》中也分别出现。

《贩书日记》四月十六日记：

明刊《罗鄂州小集》，沈宝砚批校甚精，钤长方印，一曰“宝研居士”白文，又一方印曰“太平老圃”，亦白文篆铸。印色俱相类，不审是居士所钤否？予自壬子春得见张菊生所藏居士校《庄子》，为识居士手迹之始。证以黄莞圃题跋，知居士为义门高第弟子，校勘精勤如其师。而近时叶鞠裳先生辑《藏书纪事诗》乃遗之。予因留心居士之履历手迹，思以补叶氏之

^①学苑出版社，2006年。

阙。邓孝先藏临义门校《史通》，予为发明，出居士手。

作者这里提到他发现邓孝先（邓邦述）所藏《史通》中的校语为沈宝砚居士临写。而在国家图书馆所藏《慈培书目》之《史通》条下，吴慈培写道：

己酉岁在奉天见正闇邓君^①案头有顾千里手校《史通》，亟思传录。先生谓更有何义门校本，尤为精好，当以互勘。而书在吉林，不能即致。因订异同借校之约，忽忽遂逾三年。今年夏，正闇来津，将践宿诺，适傅年丈沅叔从都中收得宗室伯希祭酒（盛昱）郁华阁遗书数十种，中亦有义门手校《史通》一部，以示正闇。正闇素能识别何氏书法，谓自藏是真迹，而傅丈所得者贗丹乱真。越日予访正闇，一见即呼曰吾误矣。盖以傅丈新收本与自藏互勘，则真者在傅丈而乱真者转在正闇，因示余真贗之别，不独书法之美弗能及，且傅丈本第七卷后有义门康熙丙戌癸巳题识二则及顾千里一跋，为正闇本所无也。余于是求假于傅丈并借正闇两本参互勘之。去年收得此张之象刻本，何校底本亦是张刻。……壬子八月七日校毕。

向读士礼居题跋，屡称沈宝砚，云是何义门高第弟子，于是心识其人。傅丈沅叔携得涵芬楼所藏校宋本《庄子》，转假临校，卷末题“雍正庚戌夏五月后一日吴门宝砚居士沈岩记”，于其名字与时代、里贯都昭昭可考。校此毕，《庄子》尚在案头，假以与邓本对勘，笔迹实出一手，乃恍然邓本即沈宝砚临而洞藿所称者也。其书法逼似义门，则菟圃所云高第弟子之语不诬，而正闇始误以为义门真迹，正不足怪。然则刘氏之宾在上行者当并沈宝砚而五矣。夫宝砚居士临其师之校兼及仲子语，又以己意补者所不及。

这里明确说明邓孝先所藏明刻《史通》中的校语为沈宝砚所临摹。不仅所述之事与《贩书日记》所载相合，而且“傅年丈沅叔从都中收得宗室伯希祭酒（盛昱）郁华阁遗书数十种”、“傅丈本第七卷后有义门康熙丙戌癸巳题识二则及顾千里一跋”等语，也与《贩书日记》的相关语句十分接近。据此而推断写《贩书日记》与写《慈培书目》以及为邓藏《史通》撰跋的为一人，应该是基本可靠的。

第三，前引《贩书日记》四月十六日日记中说到在邓藏《史通》上临写了何焯校语的沈宝砚为叶鞠裳《藏书纪事诗》所遗漏，这样的表述在《吴慈培日记》中也有反映。《吴慈培日记》二年正月初九日写道：“宝研居士沈岩为叶氏乡里，亦竟失诸眉睫。”

第四，《贩书日记》中所出现的人与《吴慈培日记》所提到的人有较多的重合，其中“傅丈”和章钰的出现频率最高，称谓也完全一致。只是目前还未能从傅增湘和章钰的相关资料中找到关于吴慈培的记载。此外“二伯父”、“三伯父”、“大兄”、“二姊”、“九妹”等称谓在两部日记中都频繁出现。

^①邓邦述，号正闇。

以上四条也许还不能够铁板钉钉地证明《贩书日记》的作者是吴慈培,但有如此多的相合之处,恐怕很难认为还有吴慈培之外的第二人。

国家图书馆在著录时,称《贩书日记》、《吴慈培日记》、《慈培书目》为稿本,经过比对,《吴慈培日记》和《慈培书目》笔体接近,且有较多的行草笔意,而《贩书日记》书写较为工整,字体近于楷书。也许是吴慈培用楷书书写,甚或倩人抄录。因此,目前无法从笔迹来判断《贩书日记》的作者。

根据一些零星的资料,知吴慈培,字佩伯,别字偶能,云南保山县人。晚清民国时期重要的藏书家和古籍校勘家,其所钞校之《道德经》、《前汉纪》、《岑参集》、《王建集》、《歌诗编》、《李义山集》等,都为学界所公认。与傅增湘、邓邦述、张元济、章钰等过从较密。但遗憾的是,关于他的完整材料极为少见。连1940年代方国瑜主编的《保山县志稿》^①和1992年编修的《保山市志》^②,也都没有吴慈培的任何记载。目前只有郑伟章《文献家通考》专列“吴慈培”一条^③,但生年依然未详,卒年也只大约为1916年。国家图书馆当初收得这部日记时未能考出其作者,学苑出版社影印出版时也只能继续视为佚名之作,也就不足为怪了。

二、《贩书日记》记事时间推测

《贩书日记》记事起于某年正月初一日,止于是年八月十二日。没有关于记事年代的说明。同样因为关于吴慈培的完整资料太少,要判定日记的具体记事年份仍非易事。只能主要依靠日记中所提到的一些事件,来做初步的推测。其中最具有说服力的有两条。

第一条,仍然是前文所引《贩书日记》六月二十一日那一条。该日所记“傅文属校《盐铁论》”,与《慈培书目》《盐铁论》条中“傅文借得扬州方地山藏本,属余校勘,……乙卯(1915)六月廿六日校毕”时间、事件基本吻合,就基本可以推断《贩书日记》的记年也在1915年。

第二条,《贩书日记》四月十一日记:“得李子东书言为予收得如隐堂本《洛阳伽蓝记》。去年,天一阁书为之窃出,有此书。”而据有关资料,1914年天一阁发生了严重的失窃事件^④。据此,则《贩书日记》所记亦当为1915年之事。

此外,《贩书日记》正月初九日还记:“闻满洲景贤售宋刊《礼记正义》、《张于湖集》、《黄氏补注杜工部诗史》、《王状元注苏轼》于袁豹岑。”其中,《礼记正义》与《王状元注苏轼》二书,作者曾与傅增湘在景贤处观摩过:“余

①云南民族出版社,2003年。

②云南民族出版社,1993年。

③郑伟章:《文献家通考》(下),中华书局,1999年,第1422-1424页。

④金涛为骆兆平《新编天一阁书目》作序称:“1914年,窃贼挖楼潜入阁内,窃去藏书一千多部,天一阁的精华损失几近一半。”中华书局,1996年,序文第5页。

于去年祀灶日,因傅丈访景贤,请观,得见此二种,为之心醉神移者累日。《于湖集》、《杜诗》未见,要皆稀世之珍。诸书并是宗室伯希祭酒郁华阁遗物。壬子岁,景贤得之,待价而沽。三四年来,竟无一人好之而有大力者。今以归袁氏矣。”壬子岁,应为1912年。自此之后“三四年来”,则应到了1915年。因而推测《贩书日记》的年份也在1915年。而袁克文日记乙卯年六月二十四日记:“森玉为购获宋刊《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二十五卷,……盛伯羲旧藏。”^①这两处关于景贤让售宋刻《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于袁克文的时间记载,看似有所出入。但也有可能其实是一致的。因为吴慈培正月初九日所记或者只是他听说这个消息,而根据古籍流传的实际情形,一部书从某人准备购买到最后插架,往往需要一段时间。袁克文日记的记载,也许就是他最终拿到《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的时间。当然,这只是一种可能性的推测。

因此,初步推测《贩书日记》记载的,就是吴慈培乙卯年(1915)正月元日到八月十二日的主要活动和见闻。

三、《贩书日记》与《吴慈培日记》之关系

国家图书馆所收藏的另外一部吴慈培日记,被明确定名为《吴慈培日记》,这部日记也被收入《历代日记丛钞》(第168册)。因为图书馆和出版社都未能够仔细考辨该书与《贩书日记》之间的关系,所以两书在图书馆和《历代日记丛钞》中也被分作两处。

这部《吴慈培日记》用印有“文美斋制”字样的竖栏稿纸书写,字迹比《贩书日记》更富行草笔意,且较多补改。记事起于某年十二月初九日,止于二年二月初三日。郑伟章《文献家通考》称:吴慈培约卒于1916年,歿时年甫三十^②。如果此说不误,《吴慈培日记》中所题“二年”则不可能是光绪二年(1876),最有可能是宣统二年(1910)或民国二年(1913)。

《吴慈培日记》(元年)十二月十六日记:“以翰文斋本《钱考功集》校席刻本二卷”,接下来之十七日、十八日、十九日、二十日、二十一日,皆有校《钱考功集》的记录,且总共校过差不多七卷。国家图书馆所藏康熙间席启寓秦川书屋刻“唐人百家诗”本《钱考功集》,有吴慈培宣统三年二月晦日校毕之跋语,跋中所说正是校勘席刻《钱考功集》之事。《吴慈培日记》(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之后至二年二月初三日,再无关于校读《钱考功集》的记录,《钱考功集》共十卷,其校勘时间当不需太长,因此,吴慈培在宣统三年二月晦日才题写校毕跋语,其中应该有什么特殊情况。但不论怎样,我们都只能认为吴慈培校勘《钱考功集》始于宣统元年(1909),而不是民国元年(1912)。因此推断《吴

^①《王子霖古籍版本学文集》第二册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41页。

^②《文献家通考》,第1422页。

慈培日记》中的“二年”即指宣统二年，而日记之起止时间即为宣统元年十二月初九日至二年二月初三日。记事显然在《贩书日记》之前。

《吴慈培日记》中所涉及的主要事情仍是藏书、校书和读书。于叶鞠裳《藏书纪事诗》之缺漏以及观阅傅增湘新得各书、李盛铎所藏黄善夫刊《史记》、《汉书》、《周礼》等，叙述尤详。

日记中还提到了吴慈培校读《卢纶集》、《王建集》等书之事，吴慈培校勘这些书籍时所做的跋语和校语，在国家图书馆的藏书中还能够看到。

日记中提到经常与之交往的人，除了傅增湘、邓邦述、章钰外，还有李盛铎、恽毓鼎、朱经农、韩子元、刘仲鲁、方药雨等清末民初的要员名士。二年正月十二日还提到“谒恽澄斋师”，看来吴慈培和恽毓鼎也有某种师徒关系。这些问题当另文阐释。

关于吴慈培这位清末民初重要藏书家的研究，目前还比较缺乏，但如果充分利用《吴慈培日记》和《贩书日记》，又与《慈培书目》以及吴慈培的校书题跋互相对读，相信可以在吴慈培的生平、交游以及一些文化典籍的流传与刊布等重要问题上较大的突破。这也正是名家日记和题跋等资料独特的价值所在。本文所讨论的虽然只是其中的作者与作时问题，但对于研究吴慈培的生平及其他问题，却是一个很重要的开端。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